

文化、科技与伦理：翻译技术课程的三维思政融入模式探究

蔡佳立

无锡太湖学院文法学院 江苏无锡

【摘要】当前高校翻译课程思政多采用“素材思政”的单一路径，本文基于翻译技术教学实践，重构翻译技术课程的思政育人机制，将文化解码、技术演进与伦理反思嵌入翻译教学全流程，实现翻译课程思政从显性灌输向隐性浸润的转化。多维路径的拓展深化了翻译课程的价值引领效能，为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的新时代译者构建新范式。

【关键词】翻译技术教学；课程思政；价值引领

【基金项目】无锡太湖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智能翻译伦理教育的课程思政融入路径与实践研究”(2025JGYJ33)；无锡太湖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数字化背景下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创新路径研究”(2025JGYJ11)

【收稿日期】2025年11月17日 **【出刊日期】**2025年12月2日 **【DOI】**10.12208/j.ssr.20250470

Integrating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ransl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a three-dimensional approach

Jiali Cai

Wuxi Taihu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Abstract】Currently,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PE) in university translation courses predominantly relies on a singular “content-based” approach. This paper, grounded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practices, reconstructs the ideological-political cultivation mechanism for transl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By embedding cultural decoding,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and ethical reflection throughout the translation teaching, it facilitates a shift from explicit indoctrination to implicit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The expansion into multi-dimensional pathways enhances the value-guiding efficacy of translation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new paradigm for cultivating translators endowed with cultural confidence, innovative spirit, and ethical awareness.

【Keywords】Translation technology teaching; IPE; Value guidance

随着《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深入推进，如何在翻译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已成为高校外语专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命题。然而，当下的高校翻译课程思政大多局限于“素材思政”的单一路径——即在翻译课程中融合中国特色翻译内容、植入中华文化元素。这些做法有一定成效，但思政方式过于显性化^[1]。本研究主张，高校翻译课程的思政仅仅嵌入碎片化传统文化或政治文本是不够的，其还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挖掘有关翻译的知识本身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以此拓展课程思政价值引领的实施路径。通过对翻译认知活动的结构化设计，使思政元素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认同。基于这种理念，本

文以翻译技术教学实践为研究对象，从翻译案例处理、技术内涵传授、智能翻译应用三个方面，探索构建翻译课程“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伦理责任”的多维价值传导路径，将课程思政融入高校翻译技术教学的全过程。

1 文化传承思政——翻译案例的处理过程

从翻译的素材和案例中挖掘思政资源，是当下翻译技术教学课程思政较为普遍的做法。本研究并不反对这一做法，但同时也认为，即便是素材思政也应该不断突破现有认知，进一步拓宽素材范畴。就本研究看来，有关翻译案例的思政教育至少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翻译、中国特色话语翻译，以及西方话语汉译修正等多方面展开。

作者简介：蔡佳立（1983-）女，汉，江苏无锡人，无锡太湖学院，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教学研究。

在高校翻译技术课程思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翻译专业课程思政的基点，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是实践翻译专业课程思政的基本路径之一^[2]。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翻译教学，教师能够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和精神内涵，进而实现价值引领。例如中国武侠文化中的“江湖”概念，应突破“rivers and lakes”的机械对应，译为“Jianghu (a chivalric realm governed by Taoist philosophy and moral codes)”，通过添加注释赋予其“道法自然、重义轻利”的精神内核；“惊蛰”这一节气的名称除音译为“Jingzhe”外，最好再补充“the awakening of insects symbolizes the revival of vitality and agricultural wisdom”的文化阐释，从而传达其蕴含的生命观。

翻译工作中，对传统文化概念的阐释，是在历史纵深中进行的一场文化考古。但当翻译的对象转向当代特色中国话语时，其挑战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此时，翻译不再仅仅是历史的阐释，更是在国际对话场域中，对一个国家治理逻辑与全球视野的即时呈现。以“精准扶贫”为例，其官方译法——无论是“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还是更详尽的“take targeted measures to help people lif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其语义的核心与力量，都凝聚于“targeted”一词。这个词标志着对传统、宽泛式扶贫理念的一次自觉偏离，其背后是一种强调“滴灌”而非“漫灌”的独特治理哲学。类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的译法也承载着一种精心构建的叙事雄心，旨在提出一种超越零和博弈、强调休戚与共的全球治理构想。因此，在教学中拆解这类术语，便不再是词条式的记忆，而是一场智识上的深度勘探。这要求我们将翻译行为本身，视为解码一个国家思想体系的钥匙。对这类中国特色话语翻译的分析与思考，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也能够使他们深入理解中国话语体系背后的思想逻辑，形成对国家和民族的理性认同，从而实现专业技能与价值塑造的融合^[3]。

但这种对中国特色话语“自我阐释”的视角，在面对西方话语时，则必须经历一次彻底的反转。此时，翻译便不再是沟通，而更近乎于一场智识上的博弈。译者若还固守着“信使”的谦卑，便无异于在话语战场上的缴械。他必须在语言的转换中，时刻警惕并校正那些西方话语中暗含的叙事偏见。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潜藏在这样一句看似客观的英文历史陈述中：

“Lhasa became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apital of Tibet in the 17th century... was retaken by the Chinese Red Army in 1950”。这里的第一个交锋点是“capital”(首都)。在国际政治的语汇里，这个词几乎是主权国家的同义词。将其不加审视地直译，无异于在中文世界里默许了一种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特定想象。因此，将这一英语词汇修正为“center”(中心)，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去政治化”操作。而更深层的博弈在于动词“retaken”(重新占领)，将其改写为“和平解放”(liberated peacefully)，是一次彻底的叙事反写。这一修正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重申了“解放”前西藏归属于中国的法理事实，更重要的是，它将事件的性质从领土争端，提升到了终结农奴制的社会进步与阶级解放的高度。将这样的案例带入课堂，学生所参与的，便是一场高强度的文本博弈。他们会真切地体会到，翻译，尤其是在涉及历史与政治的领域，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的“中立”。高阶的专业能力，恰恰体现在这种字斟句酌之间，在洞察、解构并重塑话语的每一个瞬间，自觉地捍卫一个国家的话语主权。

2 科技创新思政——技术知识的探究过程

挖掘翻译案例和素材中的显性思政元素固然重要，但是仅靠嵌入时政或传统文化素材很难有效达成立德树人的目标^[4]。我们要在素材思政之外，深入发掘有关翻译的知识本身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中国翻译技术的知识体系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其发展历程恰是观察中国科技自强史的微观镜像。在翻译技术教学中，教师可以用翻译技术史观照科技报国之路。通过爬梳自然语言处理与翻译技术的演进脉络，不仅能勾勒出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图谱，更能让学生在技术认知中感悟科学家精神，在算法演进里读懂民族创新基因。

世界范围的机器翻译技术发端于1954年IBM-701计算机的首次英俄机器翻译试验。在欧美取得先发优势的背景下，中国学者于1956年开启了追赶征程，以刘涌泉和刘倬为代表的老一辈自然语言处理学者开创了中国机器翻译的先河。其中刘涌泉主持的俄汉机器翻译项目于1959年试验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进行机器翻译试验的国家，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78年冯志伟开发首个汉译多语系统FAJRA，他研究数学方法在语言学中的应用，通过跨学科研究解决了西方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理论在中文分析上的难题，为机器翻译提供了更契合中文特点的解决方案。老一辈科学家用算盘与手稿搭建起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基

础，将这段自强不息、科技报国的历史搬进翻译课堂，不仅能让学生了解中国机器翻译技术的早期进程，还可以有效培养他们的学术品格和爱国情怀。

进入到1990年代，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成为国际主流，以谷歌翻译为代表的机器翻译技术，展示出了庞大的数据和强大的算力。面对这样的发展形势，我国学者并非简单地引进或模仿，核心命题是“追赶”与“本土化”。这一时期的中国机器翻译技术见证了军事科学院的KY-1、中科院计算所的IMT/EC-863等系统的成功。它们真正的历史价值，并不仅仅是提升了翻译的准确率，更是那个时代中国科研工作者在有限条件下奋力追赶，并与汉语这一独特语言进行艰苦“角力”的明证。可以说，那个年代的成就，充满了拓荒精神。那种在逆境中自力更生、集智攻关的精神，正是课程思政中“艰苦奋斗”和“科技自信”的生动教材，为青年学子在新时代的科研探索中树立了榜样。

而2010年后的深度学习浪潮，则是一场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范式革命。这一次，中国不再是追赶者。我们几乎是与世界并肩发展，并很快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了席之地。百度的翻译系统，展现了将海量数据与深度学习架构相结合的巨大能量；科大讯飞则另辟蹊径，在语音识别与翻译的融合上做到了世界顶尖。近年来，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更是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其凭借卓越的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在机器翻译等应用中表现优异，已成为全球智能技术版图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这一路走来的轨迹——从追赶到并肩，再到如今开始在某些前沿领域引领探索——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当代科技史。它告诉我们，科技主权并非一句空话，而是几代人知识积累与持续投入的结果。通过对中国自然语言处理和翻译技术发展史的爬梳，翻译技术教学可以描绘我国科技发展的自强不息、奋勇争先之路，弘扬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工匠精神，彰显我国科技兴国的战略发展。从而以潜移默化的知识浸润，培养学生的科技自信，启发他们的科学探索精神，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最终实现课程思政作为“隐性思政”^[4]的功能和效果。

3 伦理责任思政——智能工具的应用与审辩过程

在人才培养的环节里，科学与人文常常是交融与交织的状态，不可二元分隔。课程思政育人，也当与科学技术发展紧密结合。在呼吁多维度发掘学科课程的思政功能及价值时，汪瑞林指出“科学技术与技术伦理”是课程思政的重要方面^[5]。现如今，人工智能日新

月异，伴随而来的技术伦理风险已然成为焦点问题。其不仅在信息技术领域得到热议，在翻译技术教学，以及技术赋能思政教育领域，也均引起关注。翻译研究领域有诸多学者提出了关于翻译技术伦理性的思考，提出要通过伦理教育来指导学生形成职业认识，培养未来的翻译技术从业者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6]。思政研究领域也有人指出，要在思政课程中融入技术伦理、科研伦理等内容^[7]。

AI翻译的普及，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其潜在代价的严肃讨论。这种代价，似乎正同时作用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译者与作为沟通媒介的语言文化本身。对于人类译者而言，机器的大规模应用正在重构其职业生态。当基础性转换工作被自动化，译者的专业价值被推向一个看似更高级但实则更狭窄的领域，这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对其身份认同与不可替代性的持续焦虑。与此同时，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源自技术自身的内在逻辑。机器翻译为了追求通用性与效率，其算法天然倾向于采用标准化表达，这便存在着削弱语言丰富性与多样性的风险。在跨文化转换中，这种简化趋势更可能过滤掉复杂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肌理，从而阻碍真正深刻的文化互鉴。这两种挑战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技术发展中一个亟待审视的复杂面向。

面对这一现实，翻译技术教学若仅仅停留在工具使用的层面，便无异于放弃了教育的核心责任。我们有必要引入一种批判性的技术伦理观作为回应。马克思等人关于“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研究者应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的论断^[8]，在当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技术的发展必须接受价值维度的审视。据此，课程思政的路径也应随之拓展，着力培养学生对技术及其产物进行批判性审辩的能力。这意味着，教学不仅要传授法律法规，更要引导学生去主动探究技术应用的法律与伦理边界。学生需要被训练成能够敏锐识别并评估智能翻译结果中的潜在偏见与信息扭曲的分析者。同时，教育应明确指出，人类译者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处理那些机器难以胜任的、充满复杂性与敏感性的文本。翻译技术教学不仅要训练学生人机协同的能力，更是要培养作为跨文化沟通“最后把关人”的职业伦理与自信。

具体而言，教师可设计课堂活动，让学生对比同一段文本（如上文提及的翻译案例）的AI翻译和人工翻译，引导学生识别其中的文化偏见、信息失真或国家立场等问题，并讨论译者的伦理抉择。由此，技术伦理教育的价值便得以凸显。它并非要在专业技能之外附加

一层道德说教，而是旨在重塑专业能力的核心构成。在未来，一个合格翻译人才的标志，将不仅是他驾驭技术的能力，更是他审慎判断、抵御风险并坚守伦理底线的自觉。这种内化于专业素养中的伦理判断力，才是翻译教育能够赋予学生以应对未来挑战的、最坚实的基础。

4 小结

自2016年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提出“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以来，如何实现“课程思政”便成为每个一线教师必须回答的命题。在翻译教学领域，我们的普遍回应是将目光投向了翻译的“内容”——通过分析蕴含中国话语的文本，来实现价值引领。这一路径无疑是重要且有效的。但是，当思政的关注点过度依附于“翻译什么”这一内容维度时，一个更根本的育人场域——翻译行为本身，及其内含的方法、工具与伦理，则有被忽略的风险。尤其在翻译技术这门高度实践性的课程中，教学过程本身即构成了一个蕴藏丰富思政元素的场域：对翻译案例的处理，内在地关联着文化立场的选择与传承；对技术内涵的探究，指向了对科技创新的价值体认；而对智能翻译应用的审辩，则必然导向一场深刻的伦理责任讨论。这种思考跳出以“素材”为中心的单一路径，提出一种基于“过程”的课程思政重构。其最终构想是，以“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伦理责任”这三个内在于翻译技术实践的维度为支点，将价值引领有机地融入案例处理、技术传授与智能应用的全过程。这一尝试使得思政不再是外加的“补丁”，而是从专业知识内部自然生长出的、一种更为深刻和持久的力量，并以此推动翻译人才培养的真正转型。

参考文献

- [1] 覃军.热观察与冷思考：翻译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探究[J].中国翻译,2023,44(01):85-91.
- [2] 肖维青,赵璧,冯庆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翻译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翻译教学指南》的研制与思考[J].中国翻译,2021,42(02):65-71+190.
- [3] 喻旭东,蔡佳立.语料库平台赋能应用型本科高校外语专业翻译教学研究——基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数据库的运用[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79(7):12-15.
- [4] 时宇娇.政法类院校公共英语课“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08):30-32.
- [5] 汪瑞林.中小学“课程思政”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J].课程.教材.教法,2020,40(11):77-83..
- [6] 蓝红军.关于翻译技术伦理性的思考[J].上海翻译,2019,(04): 8-13+94.
- [7] 陈芳,陈媛琳.AIGC 背景下新文科人才培养探究——基于 ChatGPT 的分析[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4,(03):52-55.
- [8] 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马集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